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主办 第 1 期（总第 409 期） 2024 年 1 月 5 日

- ◆ 全国粮食总产量 13908 亿斤.....央视网（1）
- ◆ 无锡市人均 GDP 全国第一有感.....郭书田（2）
- ◆ 住宅用地续期问题中的几个重要考量.....刘守英（3）
- ◆ 万里并不懂农业.....赵树凯（6）
- ◆ 小岗村发展之路.....李锦柱（10）
- ◆ 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杜 鹰（13）
- ◆ 由“粮食客”想到的粮食安全之重.....赵宇恒（16）
- ◆ 寻找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座标.....丁 邢（18）
- ◆ 以农业开启和平之路.....肯尼斯·奎因（22）
- ◆ 农村老人刷短视频怎样开启“健康模式”.....赵新宁（25）

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3908 亿斤

央视网

国家统计局消息，根据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调查，202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69541 万吨（13908 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2023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18969 千公顷（178453 万亩），比 2022 年增加 636 千公顷（955 万亩），增长 0.5%。其中谷物播种面积 99926 千公顷（149890 万亩），比 2022 年增加 658 千公顷（986 万亩），增长 0.7%。

2023 年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5845 公斤/公顷（390 公斤/亩），比 2022 年增加 43.6 公斤/公顷（2.9 公斤/亩），增长 0.8%。其中谷物单位面积产量 6419 公斤/公顷（428 公斤/亩），比 2022 年增加 40.0 公斤/公顷（2.7 公斤/亩），增长 0.6%。

202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69541 万吨（13908 亿斤），比 2022 年增加 888 万吨（178 亿斤），增长 1.3%。其中谷物产量 64143 万吨（12829 亿斤），比 2022 年增加 819 万吨（164 亿斤），增长 1.3%。

（来源：央视网。2023 年 12 月 11 日）

无锡市人均 GDP 全国第一有感

郭书田

新华社讯，江苏省无锡市人均 GDP16.58 万元，在全国 29 个城市中位居第一，无锡市是一个地级市，人均 GDP 超过两个直辖市——北京、上海，超过两个省辖市——南京、广州，超过连续 35 年位于冠军的特区城市——深圳。令人震惊，刮目相视。

当今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是 GDP，既有总量，又有人均量，而以人均量为重，中国 GDP 总量已位居第二，而人均 GDP 在全球排名 67，在亚洲排名 14。从中可以看出，由于人口基数大小不同产生的差异。

在我看到这一特大喜讯后，立即发信给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曾任苏州市委副书记与无锡市委书记的刘济民同志，讨论了这件事，我说：“仔细看了超过北上广、南京、深圳，苏州，无锡人有个独特的风格：不张扬，不计较，不攀比，只知道实干会战胜一切！这三种风格是左邻右舍名扬海内外城市缺乏的，不服是不行的，事实会说话！”他回信说：“确实是这样！”他又说：“在无锡潜移默化，不张扬成为一种品格，成为一种个性。”我说：“是的，听说无锡人今天讲这个第一，明天讲那个第一嘛？有自信，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吹牛，吹牛既害人又害己，是大祸之根！”他接着说：“现在有些地方是说的比做的好听。我历来主张吴仁宝老书记论，做的比说的更好！”我说：“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是中华文化的灵魂！”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高级经济师。2023 年 12 月 20 日）

住宅用地续期问题中的几个重要考量

刘守英

2016年12月23日，国土资源部召开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对于少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后如何处理，国土资源部出台了过渡性措施，即业主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不需要缴费，可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这个消息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一、产权安排反映国家保护产权的方向

2016年以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深化改革文件中，有关产权问题的政策是全社会最为关注的，包括涉及每个人的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农地“三权分置”以及城里人的住宅用地续期，这些问题都是与老百姓利益最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些问题的关切反映了产权在社会秩序中的极端重要性。

之所以密集出台这些产权改革的文件，而且每出台一个文件就引起热议，实际上反映出我们过去改革路径下做出的制度安排在经过一些年的运行后，遇到了一系列绕不过去的问题。比如，当初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把几亿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现在有两亿多农民进城打工，他们的土地承包权是否会失去，进村包地人的土地权利有没有保障，这些问题不解决，农地的经营就会出现问題；再如，过去强调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把民营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现在这个群体已经创造出规模可观的财产，这些人的财产如果没有更安全的保障，他们进一步做强做大的积极性就会受挫。

住宅用地的产权问题更是如此。当初推进城市土地制度改革时，我们要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国有的土地上“长”出非国有的经济成分，这里包括外企、民企和公民个人财产。当时采取的改革策略是：既要公有制，又要让这些主体有投资信心。相应的制度安排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所有权保持国有，使用权赋予投资者；为了体现所有权，使用者用地实行有偿付费；为了不被说成私有化，实行有期限的国有土地租用，按不同用途分别实行40年到70年不等的使用年限。住宅用地涉及到城里人的财产，对社会稳定举足轻重，不仅年限更长，而且在对70年到期后的处置上在《物权法》中留下“自动续期”的制度空间。

这套改革路径对于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温州、深圳等地早年一批非70年住宅产权的到期，这套产权安排的问题就显现了：到期后如何续期？要不要收费？续期后的期限怎么确定？这些看似技术性的问题，背后是如何对待国有所有权，如何保护公民财产权，如何做出土地增值收益更公平、更有效的制度安排的问题。中央出台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文件以及国土部关于到期住宅用地续期的回应，之所以得到各方面的积极评价，在我看来，主要是反映了国家保护产权的基本方向，即保护已经长出来的财产权，稳定社会各主体预期，保证国家良性运转，旨在给全社会吃一颗定心丸。

二、住宅用地续期的宗旨是要保护公民财产权

温州土地续期问题从表现来看是一个个案，国土部作为政策职能部门，理应对此做出回应。由于法律修改尚未完成，国土部的免费续期回应，理所当然地是对部分地方已面临问题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但是，对于政策敏感性如此强、涉及老百姓财产权益、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关系如此重大的问题，国土部尽管是对部分地区土地已到期后如何处置的回应，也不能不考虑这一过渡性办法出台对全社会的影响。我们从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见未来处理住宅用地续期的基本原则——所给出的“业主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不需要缴费，可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的意见，导向很明确，即住宅用地使用权续期要保护公民财产权。

住宅用地使用权的性质如何界定，是续期时要明确的主要问题。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就要搞清楚在现有土地权利架构下，是如何给住宅用地使用权赋权的，以及赋权所产生的影响。为了使土地使用者安心用地、放心投资，政府对赋予开发商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充分赋权，开发商在交付政府土地出让金后，获得了住宅用地的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抵押权。购房者以市场价交纳购房款后，获得了住宅用地的共同使用权、房地抵押权、房屋所有权、住宅转让权。留下的制度结果是：在购房者的心目中，业主购得的房屋就是包括住宅用地的财产权。与私有产权下的住宅权利不同的是，其住宅财产有一个年期限限制。因此，无论是过渡期的续期安排，还是对将来 70 年期的续期问题，法律都必须充分考虑现有产权安排的结果。

我们可以设想几种不同的续期安排对住宅产权人的产权的影响及可能的反应。

第一种情形，住宅用地使用权到期后，政府以所有权名义收回土地使用权，并按价高者得的原则将土地使用权再次出售。其结果无异于一场宅地革命，将造成国家不尊重产权的印象，引起公民对产权制度保护的不信任，造成社会恐慌和不稳定。这种预期的结果是，住宅产权人在未到期之前，就会抛售房屋，引起土地市场剧烈波动，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下降，政府也难以如愿收取期望的土地出让金。

第二种情形，住宅用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但必须以现在的土地出让模式按当期土地价格再交一次土地出让金。这种安排在住宅产权人看来，他缴纳的出让金所获得的住宅只有 70 年的产权。尽管与第一种情形相比要温和一些，但在住宅产权人看来没有太大区别，无非是：你可以持有，但必须按市场价格再付一次钱。大多数住宅产权人会根据土地和住宅价格走势决定是否续期。一种可能的结果是，一些住宅产权人会选择不交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也不续期，而是将住宅出售套现。随着土地使用期限的到来，出售住宅者的比例越高，越会造成土地市场和住宅市场的不稳定，造成社会财富缩水和社会不稳定，政府获得巨额土地出让金的预期也难以实现。

第三种情形，住宅用地使用权免费续期。住宅产权人当然欢天喜地。这等于承认住宅用地产权人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得到的不仅仅是 70 年的住宅用地产权，而且是永久性产权。这也会遇到很大挑战：一是有人会提出，免费续期的话就等于现行的有期限租约只是一种形式；二是一分不交，如何体现国有所有权；三是有违社会公平。

三、所有权的实现有多种形式

我国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就在于必须体现公有制的属性。但是，从改革以来的实践来看，土地公有制下的所有权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比如农村承包地的所有权就体现为农民集体人人有份，集体经济组织不收一分租金；农村宅基地是集体无偿分配给集体成员，集体也不收取租金；城市公共用地仍然采取划拨方式，国家作为所有者不收取租金；地方政府以所有者名义向工业用地使用者供地时，长期以来以很

低的价格甚至零地租供地；国有经营性用地最早也只是有偿使用，但采取协议方式供地，只是到了实行“招拍挂”制度以后，政府才对经营性用地以价高者得的原则收取土地出让金。因此，公有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并不以是否收租来体现，也非租金越高就越体现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的实现既与国家制度安排相关，也与对所有权的认识相关，还与经济发展相关。

地方政府以土地所有权名义收取土地出让金，成为许多地方政府过日子和谋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也为我国上一轮的城市化筹集资金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土地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其功能也是不一样的。2000年以来，城市快速发展，住房需求逐渐上升，政府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入。但是随着城市转型，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供应减少，城市用地主要依托存量用地来进行城市更新，因此土地成本上升，土地出让收益下降，继续通过土地出让来实现土地所有权收益的效应会减低，这几年这种情况已经在很多城市显现出来。因此，在我看来，以政府收取土地出让金作为实现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以及用政府收不到巨额土地出让金因而城市就无法运转的理由，来主张住宅用地续期就要继续收取土地出让金，是站不住脚的。

四、增值收益分享是关键

在我看来，续期的关键是要形成全社会的广泛共识。要坚定不移地以保护住宅产权人的财产权为核心，稳定民心，保证治理有序。对土地使用者来说，土地的赋权已经很充分，住宅土地使用权人对产权有认知，权利保护的意识也非常强，实行到期续期是基本制度安排。但是，又要注重与现行制度的衔接，即有偿有期限，在保护住宅产权人完整财产权的基础上，在续期时象征性、一次性收取土地所有权租金，以实现住宅土地使用权续期的平稳有序。

至于政府如何分享未来的土地收益，在我看来，到了续期时间窗口，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政府不需要靠收取一次性土地出让金来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那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城市的维护与治理，城市土地问题主要是解决城市更新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问题。我的看法是，在考虑土地续期时，必须将此作为改革现行土地供应模式和寻找土地增值收益公平分配制度的契机。对于到期土地，绝不能延续现行土地出让模式，再收取一次性土地出让金，但也不能让住宅产权人独享土地增值，应该采取征收不动产税的方式，解决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问题，解决城市政府治理中的税收来源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大规模的土地续期还没有发生过，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如何续期的问题并没有太多参照。大片公共租赁土地续期的案例只有我国香港和以色列两个小的经济体。香港在回归之前，有过土地续期和土地收回两种租约安排，但政府从土地续期中收取的租金很少，还受到相关团体的抵制。以色列对于到期土地收取该年土地价值的2%，且为了防止因一次性收费过高导致公众难以负担，而在使用权到期之前开始分期收费。从这两个地方的经验来看，政府期待通过续期再收取一笔土地收入的想法不可能实现。

土地续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在两个如此小的经济体尚且如此，在我国涉及到如此大群体的住宅用地续期，更是一个必须十分慎重的政治问题，不仅要早作安排、提前谋划，还要营造稳定预期的氛围，这些比动脑筋去收土地所有权租金的问题要重大得多。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1年1期。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万里并不懂农业

赵树凯

懂农业和懂农民，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或者说，懂农业未必懂农民，懂农民未必懂农业。本人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想到了当年关于家庭承包的政策争论。在争论中，万里说自己不懂农业，同时，他严厉批评农口部门领导人不懂农民。

一、直到晚年，万里说到农村改革，仍然会说自己并不懂农业。1981年7月，万里在一次会议上还说：“我于农业并无成见。”随后解释，他对农业不了解，对农村工作不熟悉，到安徽时并不知道怎样解决农业问题，但他相信农民的智慧 and 创造。万里说自己不懂农业，虽有自谦，却也实在。

何谓懂农业？显然，四十年前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名词未变，内容迥异。大致而言，农业有两层含义。一曰“农学”，诸如育种栽培、植物保护、土壤之类；二曰“农经”，即所谓“农业经济”，指农村各项经济活动，也包括林业、畜牧、渔业、副业等。改革之前，“农业经济”与人民公社体制有内在联系，或者说，人民公社管理是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内容。那时的农业工作，核心是要掌握这个体制以及政策。对于官员来说，通常说是否懂农业，并非特指是否掌握农业生产专门技术，而是指领导农业工作是否有专门经验。显然，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万里确实不懂农业。

在主政安徽之前，万里并没有领导农业工作经历。战争年代，他曾多年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但那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农业工作。1949年春，万里离开冀鲁豫解放区，随刘邓大军南下。南京解放后，万里参与接管南京，担任南京军管会经济部长和建设局长。从这时起，万里开始接触城市工作。是年末，万里又随同刘邓大军进入大西南，参与筹建西南军政委员会。到重庆不久，邓小平找万里谈话，让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本人在参加《万里文选》编辑过程中，看到这段时间的一些资料，大都是万里接管工厂的讲话文件等。1953年初，万里奉调进京，担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后来城市建设总局改为城市建设部，万里任部长。由此开始，万里集中精力于城市建设管理，倾心于学习建筑。1958年春，万里调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这次调动与他懂城市建设直接有关。进入五十年代中期，中央考虑在北京建设一个大型会议场所（即人民大会堂）。随后，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等。万里从城市建设部长调任北京，就是要担任十大建筑总指挥。万里负责这项浩大工程，成绩卓著，被毛泽东称赞为“日行万里”。

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近十年间，万里没有分管过农业和农村工作。他晚年曾回忆，这些年来去农村时间也不多，更很少对农业农村工作发表意见。大跃进时，他到农村去，看到公共食堂，曾经表示过担忧和不解。但因为并不分管，他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影响。文革中间，万里随邓小平复出担任铁道部长。

正如不懂农业一样，万里也没有铁路工作领导经验，但他整顿铁路业绩斐然，受到普遍赞誉。但是，在铁道部工作一年后又被打倒。粉碎四人帮之后，万里调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工作不久，就转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若问万里最懂什么专业，应该说最懂建筑。李瑞环还是建筑工人时，参与人民大会堂等工程建设，因为表现优异受到万里赏识，后来长期在万里领导下工作，称得上是最了解万里的人。1993年夏天，时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召集《万里文选》编辑组会议，他在谈话中用了较长时间介绍万里。李瑞环介绍，万里长期领导城市建设，对建筑下过很大功夫学习，对于中外建设历史都有研究，早年曾经想写一部中国建筑史。李瑞环说：“在我党的高级干部中，万里是最懂建筑的”。

本人认为，万里所以在农村改革中建立功勋，并不是因为懂农业，而是因为懂农民，特别是，他懂得尊重农民，并且敢于为尊重农民承担政治责任。大权在握的政治家，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决定，懂不懂某个具体专业并不重要。

二、很多党政领导往往被称为“万金油”，意为不懂专业。实际上，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对于不同人所擅长的工作领域，有特定的评价标准，诸如有工业专家、农业专家的说法。从农村工作来说，与万里年龄相当、资历相近的高级干部中，有一些领导人称得上农村工作专家。

赵紫阳可以说是一位农村工作专家。战争年代，在冀鲁豫解放区，赵紫阳和万里都曾在地委书记。建国前夕，赵紫阳随大军南下到广东。与万里主要做城市工作不同，赵紫阳主要做农村工作。赵紫阳先是担任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长，领导土改和合作化，后来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期间，也长期管农业。文革后期，赵紫阳在出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之前，曾担任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也曾主管农业。

华国锋也可以称得上农村工作专家。南下到湖南后，华国锋先是担任县委书记；农业合作化时期，华国锋写的调查报告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华国锋曾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多年在农村工作第一线，后来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是分管农业。文革中间，华国锋到中央，连续几年分管农业。毛泽东曾批评华国锋“满脑子农业生产”，而对阶级斗争关注不够。

比赵紫阳、华国锋略年轻些的纪登奎也是农村工作专家。建国之初，纪登奎在许昌地委副书记任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因为汇报工作受到毛泽东赏识，主要是汇报农村工作。在五六十年代，纪登奎担任过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在农业工作一些重要问题上，毛泽东多次听取纪登奎汇报。毛泽东主持起草《人民公社管理条例》（即60条）时，曾经专门请纪登奎参加会议。在确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架过程中，这个“队”是“生产队”还是“生产大队”，开始上层内部有不同意见，后来确立为生产队，就是毛泽东吸取了纪登奎在河南创造的基层经验。

同样是党内农村工作专家，在改革早期的表现多有不同。赵紫阳在主政四川时，就积极推动农业政策调整，创造了早期改革的重要经验；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对家庭承包表达了温和而明确的反对；纪登奎在分管农业工作时，基本上坚持了人民公社六十条的立场，但是对于家庭承包表达了理解。可见，既往的工作经验本身，并不绝对地影响本人的政策立场。

文革中的副总理陈永贵，曾一定程度上分管农业。陈永贵本身就是农民，长期担任大寨村支部书记，也担任县、地、省的领导人，不能说不懂农业。文革中，特别是文革后期，陈永贵提出了系列政策主

张。从这些政策主张来看，显然不能说他懂农民，更不能说懂得尊重农民。陈永贵坚决反对在农业生产中搞按劳计酬，认为按劳计酬是即所谓“物资刺激，工分挂帅”，推行所谓“大寨工分”（又称“大概工分”）；反对农村自留地、家庭副业，主张关闭集市贸易，甚至连农民养鸡养鸭也不准；主张“穷过渡”，即主张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提升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实质上，“穷过渡”就是让农业生产搞更大规模的大呼隆，搞更大规模的大锅饭。在陈永贵看来，大锅饭越大，公有制水平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如果农民不赞成不积极，则是农民落后愚昧，甚至反动，就要“批判”、“斗争”、“专政”。应该说，如果一个领导人真正尊重农民，不会这样对待农民。

三、万里于1980年春天到中央，主管农业至1986年。在推进包产到户过程中，曾经激烈批评农口部门思想僵化，不了解农民，不懂得尊重农民。

万里尖锐批评国家农委、农业部、农业机械部等农口单位，也指名道姓地批评有的部长。万里感叹，农口以外的部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单位，倒是思想比较解放，不那么僵化。万里在农口部门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整顿，要求农口领导干部大规模下乡，看看农民在做什么、想什么。他批评农业部门，“坐在大楼里对农民指手画脚”，“农民吃不上饭，不见你们说个啥话，农民搞了包产到户，吃上了饭，你们忧心忡忡，指责农民破坏了社会主义”。道理上，农口部门最懂农业，最了解农民，但是，却在改革中成为重大阻力。这是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当时农口部级干部中，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被认为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代表人物。李友九长期从事农业领导工作，堪称是农村工作专家。五十年代初期，李友九进入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中层部门负责人，后来，到广西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文革前，到甘肃省委担任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文革后期，到农林部担任副部长，分管政策研究、人民公社管理等。从领导工作经验来说，显然谁也不能说李友九不懂农业。但是，从包产到户刚刚出现，直到很多年后，李友九都坚持不同看法，态度并没有改变。

万里曾多次严厉批评李友九。1981年3月11日，万里在国家农委党组会议，说：“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一股劲儿？实践的东西，理论的东西，实践和理论结合的东西，都说服不了他。”但是，万里也表示了某种赞赏：“这个人有个好处，不隐瞒自己观点，我喜欢这样的人。不管是谁讲的，即便是小平同志讲的，他都提出不同意见。我说，你有意见可以写报告。”从李友九回忆录来看，他的这种坚持和执着，越到晚年越清晰明确。显然，李友九反对包产到户，是基于政见不同，是一种政治信仰的力量。

从当时的政策纷争过程来看，还有一种反对态度，不关乎政见和信仰，而是出于对政治机会的把握。那时很多领导干部，内心对包产到户有认同，但是并不选择支持，而是选择了追随政策主流，上级文件怎么说就怎么做，让批判就批判，不让搞就不搞。如果从特定政治标准看，这些官员只是听命于上层的政治决定，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主动改革，缺乏创新勇气，显然不值得称道。但是，如果换一种标准看，在现代国家体制中，负责政策制定的政务类官员（所谓政客）与负责政策执行的事务类官员（公务员）各有角色，事务类官员坚持政治中立，忠实于执行既定政策，而不是在政策主张上自搞一套，这也是无可指责的。

四、从根本上说，懂不懂农民，能不能尊重农民，其实并不决定于是否懂农业，不在于懂多少农业

生产，不在于懂多少农村经济管理，而在于政治理念，包括思想感情、意识形态等。

如果说，懂农民是指能够理解农民，特别是知道农民的需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了解农民需要的情况下，是否愿意顺应农民需要，尊重农民意愿，这是根本性问题。进而，如果愿意顺应农民的需要，尊重农民意愿，则接下来的问题，是否敢于为农民而坚持，敢于为尊重农民承担政治风险。或者说，是否能够理解农民，是否愿意尊重顺应农民，是否敢于为农民而担当政治风险，这是三个问题。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应该既能理解农民，也愿意顺应农民，还敢于支持农民，即做到“三位一体”，才能成为改革家。万里等改革家的伟大，不在于懂农业，而在于懂农民，懂得尊重农民智慧和创造性，敢于支持农民的权利要求，而不是把农民视为“群氓”、“阿斗”，认为农民“落后”、“愚昧”，而只有领导人最聪明，农民应该按照领导构想的方式去生活，农民的生活应该被领导们设计、规划。

人民公社体制的根本问题，是这种体制不承认农民的智慧 and 创造性，不容忍农民的伟大。因为，这个体制把所有农民视为公社这个体制机器中的零件，不容许其自主权，抑制其创造性。万里曾经指责这种公社体制是“集中营”，是“剥夺农民的最有力工具”。1981年7月，在一次会议中讨论到宪法修改中的人民公社问题，万里指出，“要废除人民公社”，“巴黎公社长不了，我们的公社也长不了”。因为人民公社不承认农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不尊重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所以，从根本上，农民最终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体制。

关于农村改革成功的根本经验，党中央文件已经有精辟总结，就是尊重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承认和容忍农民的伟大，不应当仅仅是一种理念，或者说不应该仅仅表述为理论总结和政治宣传，更重要的是，要体现为制度化保障。如何从制度上容忍、保障农民的创造精神和选择权利。这是又一个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当代农政，2023年12月25日）

小岗村发展之路

李锦柱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区，1955年成立互助组时，因为地处岗地，起名“小岗互助组”，故“小岗”由此而得名。现有23个村民小组、4397人，村党委下设13个党支部，有党员145名。2022年，小岗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30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3万元。

大包干精神

1978年冬的一个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凑在一起，为在全国农村率先实行“分田到户”、实现农业“大包干”立下生死状，按下红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户户主鉴（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沈浩精神

2004年2月，安徽省财政厅沈浩同志受省委选派到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2009年11月6日，沈浩同志因长期积劳成疾，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沈浩的精神实质是对党忠诚、一心为民，扎根基层、开拓创新。

小岗精神

小岗精神以小岗村民首创大包干为核心，以45年来小岗改革发展为主要实践场景，以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为宏大时空背景；肇始于小岗又不拘囿于小岗，涵盖中国广袤农村和亿万农民；起源于大包干又承载45年农村改革发展波澜历程；凝结着小岗村民的独特思维意识、亿万农民的普遍文化心理和先进政党卓越不凡的精神风貌等丰富精神元素。

其中，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书写了基础的主体篇章；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沈浩精神书写了又一历史阶段重要篇章；新征程推动乡村振兴中展现的敢于奋斗、敢于创造、敢于担当的精神气质正在书写新时代的精彩篇章。

党和国家的关怀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1981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哥伦比亚外长莱莫斯时说：“有个美国女教授到我们历史上最穷的地方——凤阳访问，看完后印象很深……最近两年多有变化，农村实行了新的农业政策——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地方还是这个地方……现在一下子变了，而且很不错，就是这一两年的时间翻了身，完全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

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同志来到“大包干”纪念馆，感慨地对小岗人说：“在当年‘一大二公’的环境下，你们敢于包干到户，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你们靠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靠的是改革的勇气，靠的是团结的力量，靠的是穷则思变的精神，说明路是人闯出来的。”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鼓励小岗人继续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努力建设美好家园，“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承包期再延长31年不变，而且31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

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同志来到小岗村视察。他对小岗村村民的探索精神和发展成绩表示赞许：“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胡锦涛同志殷切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努力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把文化生活搞丰富，把村庄环境搞整洁，使日子过得一天更比一天好！”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小岗村考察，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激发了小岗人改革创新的精神。

坚定不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小岗村党委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配强村党委班子，坚持强化思想教育和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用红色基因强基固本，用改革思维推动工作，用为民情怀改进作风。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第一时间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及时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用干部辛苦来解决百姓疾苦。坚持担当作为，积极为村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氛围、创造环境、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把政府有为的手、市场无形的手和百姓勤劳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汇聚乡村振兴的不竭动力。

小岗村围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不断提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围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实力；围绕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不断提升村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用党组织的担当作为凝聚起群众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思想认同和行动跟从，形成“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发展态势，全面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向心力。这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改革的坚定领导者和推动者，坚持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

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

小岗村紧紧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这条主线，全面完成2.2万亩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1.37万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顺应农民意愿，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全村土地流转率超过七成，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和劳动力。巩固了所有权，稳定了承包权，搞活了经营权。“红证书”不仅是“定心丸”，还是“活资产”“金钥匙”，打开了致富路。试点“股田制”，小殷村民组43户村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运营小岗村民益土地股份合作社。探索农村金融改革，以小岗乡村振兴银行为金融产品创新主体，试点发放“兴农贷”“劝耕贷”，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等，有效破解了乡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连续6年给村民分红累计达1400多万元，实现了从“户户包田有地”到“人人持股分红”。事实证明，改革激发了活力，整合了资源，破解了难题，推动了发展。从大包干的“红手印”到土地确权颁证的“红本子”，再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分红利”，实现的是小岗百姓红红火火的美好生活。正所谓“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

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

小岗村牢记“国之大者”，在做好以粮食安全为根本的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面推动农业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实现高标准农田全域覆盖，“引水上岗”“引淮润岗”解决了困扰小岗千百年的用水难题，大幅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打造小岗现代农业种植示范区，推广农业新品种、

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布局设施农业，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引进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涉农高校合作，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推广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做给农民看、带着群众干、帮助百姓赚，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抓手，深耕“农业+”，在一产做优基础上，实现二产做强、三产做旺，以小岗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为载体，招商引资、园区建设，项目投产达产齐头并进，构建“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打造绿色食品加工集群。突出特质禀赋和独特资源，培育红色旅游、休闲观光、研学拓展、教育培训、民宿会务、农村电商等第三产业。初步形成了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农产品加工为主线，乡村服务业为支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市场化格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事实证明，只有因地制宜，依托资源禀赋，科学统筹谋划，才能找准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正确路径。

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小岗村推动全部村民实现小区集中居住，村域道路硬化、绿化、美化、亮化，水、气、污水管网、网络等基础设施配套一应俱全。开展文明创建和环境卫生整治“网格化”管理，开展“美丽庭院”改造提升行动，村容村貌更加整洁美观、村庄环境更加生态宜居，实现园区、景区、社区融合，生产、生活、生态融合。持续加大教育奖励力度，提升小岗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积极推进智慧医疗覆盖小岗，家庭医生签约率达100%。加强小岗敬老院硬件建设和服务管理，持续推动“老年助餐”等暖心工程，提升养老保障水平。村集体经济收益持续为村民分红，为村民的新农合、新农保、政策性农业保险“买单”。逐步建立健全普惠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每位村民分享到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新生活。

小岗村持续完善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机制，实现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发挥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落实“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制度。成立义务调解委员会，形成了协商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持续加强德育教化，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开展文明新风户、美德少年、好婆婆、好媳妇等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持续提升推广“美德银行”经验，推进移风易俗，用小积分撬动大治理，以有效治理促进乡风文明。发挥数字赋能在乡村治理中的乘数效应，建设数字小岗平台，实现数据多跑腿，省心又省力。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依法治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与解决村民合理诉求相结合、与民主管理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建成了安徽首个国家级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治融合”，实现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实践启示我们，只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一定能实现农村的和谐稳定。

展望

小岗村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重要批示精神，运用好小岗村7年来践行总书记殷殷嘱托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围绕走好质量兴农、城乡融合、绿色发展、文化兴盛、乡村善治、共同富裕等“六个之路”，聚焦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把改革的文章做好，把发展的劲头鼓足，把和谐稳定的工作抓好，让小岗村在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工作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打小岗牌，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唱经济戏，干实在事，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探索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做出新贡献。

（作者：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来源：《中国村庄》杂志第11期）

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

杜 鹰

2023年10月29日，“中国农大一腾讯为村乡村CEO计划”（二期）沙龙活动暨共富乡村共创可持续沙龙（第六期）在杭州举办。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杜鹰解读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就乡村CEO经营乡村，他重点强调打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乡村振兴特别需要改变农业传统生产方式，要处理好龙头企业、集体、农民三者关系，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四个关键问题。

以下为讲话内容摘编：

很高兴今天和乡村CEO在这里交流，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在关注乡村、扎根乡村，由衷地感到高兴。结合我的观察，以观点带资料，讲几个乡村振兴的重点问题，供大家参考。

一、打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如果单算进口的话，现在，中国是国际农产品进口第一大国，已经超过美国。进口的主要是什么？是我们的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以后的高蛋白食物，出现了供求缺口，明显短缺因此要进口，比如大宗的大豆是作为饲料，玉米也是作为饲料，油料、糖料、奶类、肉类都是高蛋白食品。

生态学上有一个定律叫林德曼定律，就是在一个生物链上后一级的生物，从前一级生物能有效转化过去的能量只占10%，所以又叫1/10定律，另外90%都在转化过程中失去了。我们吃的奶类和肉类是生物链上后一级的生物，前一级是玉米、豆类等，所以我们喝奶和吃肉多了，玉米和豆类的消耗会大幅增加。

所以，从需求角度来看的原因，就是因为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变了，吃得好了，反而对粮食需求更多了。

而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一个是中国人多地少水更少，第二就是我们基本上仍然是小农供给结构，这两条加在一起导致中国农产品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非常快，导致农产品价格失去了国际比较优势，大量的农产品进口到了我国。

再加上我们面临一个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时期，我们应该把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所以说，打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因此，在我们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要首先重视粮食和农产品有效供给这一大功能的振兴。

我在农村观察，乡村产业振兴的类型大概归为两类：一类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田园综合体模式，另外一类是以农业作为第一车间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这两种模式对应农产品有效供给、生态环境保护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三大乡村振兴的功能。

这两种模式最终产出的产品不一样，农产品、物质产品对应农产品有效供给这一大功能，不限于粮食，所有可以让人们获取热量的都叫农产品，也不只限于农业第一车间的产出，还包括经过加工以后变成的食品。

后两种功能，一个是生态文明，一个是传统文化传承，这两个也可以为市场提供产品，提供服务产

品。

如果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能够结合，是最好不过，但是无论如何，都应该把提供物质产品，提供农产品有效供给，放在乡村振兴功能的第一位。

这两种模式它不是排斥的，是可以融合到一起的。但是从普遍意义来讲，第二种是更为普遍的乡村振兴模式。

我为什么这样说，全国 50 多万个行政村，真正能发展农文旅的，据我观察大概有 10%左右，所以第一种模式只是适用于少数的乡村，对更大范围的乡村则适用于第二种模式，如果可以把两种模式融合在一起、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理想的发展、很大的创新。

二、乡村振兴特别需要改变农业传统生产方式

无论是刚才提到的哪种产业模式，都需要改变农业传统生产方式，改变传统资源利用方式，实际上都是资源要素的重组，有对乡村原有资源要素利用方式的改变，但也肯定要有城市下乡新要素的嵌入，使整个产业形成一个更高盈利能力的产业链。

比如，基于水稻供应的农文旅产业，怎么来改变传统资源利用方式？原来种稻子就是种稻子，现在改为种彩色水稻了，供给的形态就从米饭变成了“米饭+观赏”。

要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乡村振兴的成功才有可能。这个改变是需要有条件的，就是现代生产力的进入，现代生产力进入到传统乡村的资源和文化里面，结合在一起，加以改变。

乡村 CEO 将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变，把乡村原来的这些资源，稍微变一个形态，马上就可以变成是市场需要的产品或市场更需要的产品。

这其中有一个环节最重要，农产品加工业，90 年代中国刚刚兴起农产品加工业，那时候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是 1: 0.8，到如今是 1: 2.4，而发达国家更高，所以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有一个无限的前景。

加工业对农业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加工业对农业生产作为第一车间提出新的要求，加工业对农业的规模化、标准化提出要求，对上市时间、产品品质都有要求，这就把农业第一车间的整体生产状态和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另一个方面，饭桌是农业的最终需求，加工业是农业的中间需求，农业发达不发达，很大程度上看中间需求的扩张，中间需求的扩张不仅是对前端农业第一车间的拉动作用，还对后端整个产业链的市场化和品牌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希望大家在实践中，特别注意要改变传统资源利用方式，这是我们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最需要做的事情。

三、要处理好龙头企业、集体和农业三者关系

乡村 CEO 是要经营公司的，公司、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关系一定要衔接，处理好这个关系，经营公司就变得顺当了，处理不好，就很难再经营下去。

这三者的利益联结大体有四种方式：

第一种是订单农业，是非常简单的市场行为，就是公司向基地下订单，基地就按公司的要求提供农产品作为原料，公司用市场收购的办法。

第二种是建立生产基地，龙头企业流转土地规模经营，农户除了拿到土地租金外，还可以在基地打工拿到劳务收入。

第三种方式是利润返还，比如浙江的丝绸公司，采取保底价收购蚕茧，再从公司盈利里拿出一定比例返给集体和农户，这种方式就更加稳定了加工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第四种方式是股份合作，加工企业出资金、机器设备入股，农民拿土地入股，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利益均沾、风险共担。

很难说四种利益联结方式哪种更好，要看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

政策上更加提倡股份合作，因为是命运共同体，但在实践中，股份合作反而最难，根据我的观察，真正采取股份合作的也就 5%左右。

为什么股份合作反而最难？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企业不愿意，一般的企业会认为，已经给了农民租金、薪金，就不愿意通过分红让农民获得更多收益，进而减少了企业发展壮大的资金。二是，农民也不愿意，农民认为企业盈利还好，如果亏了，是不愿意承担亏损的风险的，因此也不愿意绑成利益共同体。

乡村产业的发展，不同利益的主体，需要形成一种什么关系，是依条件而定的，政府不要干预，是市场的行为。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如果产业链的规模不够，农民的谈判地位不提高，整个农村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不提高，就很难形成股份合作的方式。

乡村是血缘关系、熟人社会，不是城市的市场经济关系、商品关系、契约关系，所以，乡村 CEO 在处理公司集体农户的关系上，要多下功夫，好好琢磨，学会跟农民打交道。

四、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什么重要呢？

乡村振兴是一个改变资源利用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关系调整的过程。这个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我们集体经济有直接的关系。

过去，村集体大体有三块资产，第一块是土地，40 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这部分资产划分清楚了，第二块是非土地的非经营性资产，第三块是非土地的经营性资产。

我们讲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指的是第三块资产。近些年，通过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清产核资、划分股份、确定成员权、股份量化这四步走，把这块资产也划分清楚了，现在发展成了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村民成了村集体经济的股东。

我要讲的重点是，要注意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不是一般意义的市场企业，股份合作改革以后的村民变股东，也并非真正市场意义上的股东，我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全世界非常特殊的一种所有制形态，集体所有是指的村民共同所有，因此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封闭性和社区性，表现为，即便股改以后，村民的股份仍然不能够在社会上流转，而只能作为分红的依据。

这个和我们企业搞股份制改革，看着好像形态上差不多，本质上有根本的区别，它的要素不能流动。我国的民法典给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设立了特殊法人地位，公司法不适用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股改和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不一样的地方是成员不能流动，成员的股份不能流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不能破产。

那么，不能流动资产的集体经济怎么可能和市场经济对接呢？

这里的办法是在集体经济合作社之下，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拿出一部分资产建立一个股份公司，这个股份公司是有限责任，股份可以进行流动，公司可以破产，这是我们农村的集体经济和市场经济对接的唯一出口。

这是我今天想和乡村 CEO 们交流的四个观点，供大家参考！

（作者：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2023 年 11 月 2 日）

由“粮食客”想到的粮食安全之重

赵宇恒

近日，一段“背粮男子大闹青岛胶东机场”的视频引起网友关注。视频里，一名乘飞机自山东青岛前往韩国的旅客，因手提携带大量粮食超重，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导致航班延误一个多小时。视频被广泛传播，“粮食客”备受热议。

代购不稀奇，这些年我们也看到过不少往来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背包客”，化妆品、保健品、日用品，甚至小型家电等，都在他们的代购清单里，这些商品大多价格较高、利润空间较大。相较之下，粮食重量大、价格低，在我们的惯常认知中，代购粮食实在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粮食客”就显得格外特别。

飞往韩国的航班上为何会有“粮食客”？这就要从韩国的粮食市场谈起了。韩国粮食自给率低、本土农产品昂贵大家早有耳闻。根据韩国农业部门的相关数据，2021年韩国粮食自给率为44.4%，这就意味着50%以上的粮食需要依赖进口。而与我国相比，韩国粮食价格普遍更高，部分品种出厂价是我国的三到四倍。大量市场需求兼之可观利润，“粮食客”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粮食客”并非近来才兴起的新行当。有知情人士表示，从刚有跨境代购起就有了“粮食客”，他们频繁往返于中韩两国，从中国背粮食去韩国，又从韩国背化妆品等到中国。之所以近期成为舆论焦点，主要是有网友担心这会危及我国粮食安全。保持这样的警醒当然可以，不过一来“粮食客”肩背手提的数量有限，二来他们的背包里装的大多以干辣椒、花生、各种豆类等为主，大米等口粮很少，倒也不必太过忧虑。

此次“粮食客”引起的关注，在让我们关心邻邦吃饭大事的同时，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从斯里兰卡破产到卢拉落泪、再到“粮食客”，近年来，由粮食引发的国际热点话题，一再验证着我们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正确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我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3908.2亿斤，这已是我国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充分证明我们有能力端稳中国饭碗。可即便如此，我们在保障粮食安全一事上依然丝毫不可松懈，仍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付出十二万分的努力。

首先，确保有地种粮是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粮食价格的根本。自有统计数据以来，韩国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本就有限的耕地一减再减，直接导致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由于本国粮食产需缺口较大，韩国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反观国内，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耕地保护也同样面临着很大压力。我国人口体量巨大，耕地的问题直接关系到14亿多人的饭碗能不能端牢，更加不容有失。这就要求我们拿出更多硬招实招牢牢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既要保数量也要重质量，在保证有地可种的同时，还要确保“良田粮用”“应种尽种”“种足种满”。

其次，确保口粮安全要统筹算好政治账与经济账。大米是韩国人的主要口粮，在韩国家庭全年粮食消费中占近九成。但受 2022 年大米价格持续下跌等因素的影响，韩国政府开始鼓励农民种植其他作物，今年稻谷种植面积创下历史新低，大米产量总体下降。加之全球米价上涨，今年韩国大米价格回升。粮价乃百价之基，不同于韩国，我国粮食价格变动的巨大影响，一旦有风吹草动，带来的连锁反应更加强烈。我们要坚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抓好粮食保供稳价、防止“米贵伤民”，也要不断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防止“米贱伤农”，统筹算好政治账与经济账，切实扛稳“米袋子”。

最后，在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日趋多元的背景下，要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基础上，更加重视食物安全。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韩国对大米之外的食物需求量正在逐渐增加，这也是“粮食客”的背包中花生、豆类等更多的原因之一。近年来，随着居民饮食结构的调整，我国对口粮之外的食物需求也在日益增加，而各地饮食偏好又各有特点，更需要我们立足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粮食和重要农产品都要产得出、供得上、买得起，从更广阔的视角把握食物安全。

“粮食”二字重千钧，无论在哪个国家，保障粮食安全都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这其中的分量，“粮食客”背不完，更背负不起。

（作者：农民日报记者。来源：农民日报客户端，2023 年 12 月 25 日）

寻找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座标

丁 邢

12月10日到15日，我和来自全国100多所院校的300位新三届学友，在天津港登上地中海号邮轮，共同参加了一次六天五夜的海上旅行。

12月11日下午，举行新三届四十年海上论坛，我应邀发表了演讲，讲稿全文如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

面对新三届学友，分享往事，我感到诚惶诚恐。

我是1951年生，1977年参加高考，录取到山西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我的主要职业是期刊编辑，从《晋阳学刊》，到《炎黄春秋》，先后供职于多种杂志。我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命运史，写过一些书和文章。我不曾在任何出版社工作，更不掌握体制内的任何资源，只是在市场的夹缝里，以敲边鼓的方式，介入过一些图书出版。

下面就讲讲与顾准、遇罗克、韦君宜、黄万里相关的出版往事。

顾准30年代参加革命，50年代、60年代两次被打成右派。受难使人思考。在计划经济被当成金科玉律的年代，他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全面质疑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超越了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对革命作出追根溯源的反思。他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吴敬琏说，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顾准1974年底去世，只活了59岁，死在改革开放的前夜。但他的精神遗产，在转型时代大放异彩，学界公认他是当代中国最卓越的思想家。顾准思想的精华，突出表现在他和弟弟陈敏之的通信里。80年代，陈敏之把这些通信编成一本书，取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但出版不顺利。1994年，是他逝世20周年。1995年，是他诞辰80周年。陈敏之自掏15000元，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顾准文集》，首印3000本。顾准不寻常的价值，知识界一个小范围早就知道。我供职的《晋阳学刊》，80年代登过他的遗作。1995年2月，我路过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看到“《顾准文集》已到”的广告，赶快买了一本。接着发表了三篇读后感。1996年1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陈敏之，到了北京，要和我见见面。我赶到他下榻的招待所，和他谈起，顾准是否还留下了一些未曾发表的文字？陈敏之告诉我，他手里有顾准的日记。

不久，我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老编辑黄德志。她经营社科书店，问我有什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书稿？我谈到顾准日记。她对顾准十分钦佩。当下说定，我找陈敏之联系书稿，她联系出版发行。陈先生很快就把日记的复印件寄给我。共三部分，一本是顾准1959年10月至1960年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时的日记，一本是顾准1969年11月至1971年9月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日记；一本是

顾准 1972 年 10 月到 1974 年 10 月在北京读书生活的日记。日记记录了饥饿的威胁、疾病的折磨、失去亲人的悲痛、没有读书、写作的时间和条件的苦恼。在物质匮乏和精神折磨的双重压力之下，顾准关注的仍然是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工业，到农业；从物价，到财政；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从国内，到国际，他都有独立的见解。我拿到了稿子，黄德志联系出版不顺利。一家出版社的总编同意出，社长不同意；一家出版社的一把手同意出，二把手不同意。我只好继续找别的出版社。我向《书屋》主编周实谈起此事，他介绍我认识了谭合成，谭合成愿意投资出版，找到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她拍板开了绿灯。与联系出版的艰难相比，编辑过程一路顺风。我请李慎之作序、王元化题写书名，吴敬琏接受采访，都很痛快。陈敏之当时 77 岁，他和我一起，捧着清样，连着校了四天。谭合成投资《顾准日记》并非偶然。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作家，著有记述道县惨案的力作《血的神话》。

《顾准日记》1997 年秋天出版，好评如潮，再次掀起“顾准热”。北京出版社一个编辑约我写《顾准传》。我说，为顾准立传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没有几年功夫难以完成。但我想编一本回忆与评论顾准的文集。他表示可以，但希望书里有一些新材料。说定要访问一些顾准生前友好。我先后访问了好几位和顾准有过直接交往的人，又与陈敏之联系，请他回忆顾准的家世。当时陈先生刚刚做了胃切除手术，化疗后体质很虚。直到 1998 年 1 月，他才同意我去采访。我到上海华东医院见了陈先生以后，他告诉我，了解顾准的生平，有一个材料可以参考。于是，他把保存了多年的顾准在 1968 年到 1969 年写的 20 几万字的交待材料借给我看。我一看，价值非常高。顾准把自己 50 岁以前的主要经历、社会关系和思想历程都写到了。于是，我和陈先生商量，能否以《顾准自述》为题，出版这本书。陈敏之同意了。我和出版社签了合同，决定同时出版《顾准自述》和《顾准寻思录》。我编好了书，出版社也排出清样，陈敏之却来信说，《顾准自述》缓一缓，先出《顾准寻思录》。原来，上海有人正在撰写顾准传记，他怕《顾准自述》出在前面，影响传记的市场，恳求陈敏之，在他的传记问世之前，不要让《顾准自述》面世。陈敏之答应了他的恳求。北京出版社本来更看重的是《自述》，《寻思录》只是捎带，一看《自述》不出了，《寻思录》也就打了退堂鼓。

我只好再找其他出版社联系。作家出版社唐晓渡理解顾准的意义，说服社领导，接受《顾准寻思录》的选题。发行部门表示，市场没把握。我只好找朋友帮忙。董怀明说，我尊敬顾准，这本书的市场风险我包了，成为投资人。

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顾准文存》，我建议陈敏之和顾准的儿子达成谅解，共同出版包括《顾准文稿》《顾准日记》《顾准自述》《顾准笔记》的四卷文集，比较全面地展示了顾准的思想遗产。

再说遇罗克。90 年代中期，我认识了在座的徐晓女士。她是北师大中文系 77 级，当时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工作，1998 年夏天，徐晓问有什么好选题，我提出编辑《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与她一拍即合。她提议邀请徐友渔共同完成。在各方朋友支持下，一个月就集中了书稿的全部内容。

遇罗克生于 1942 年，高中毕业，两次参加高考，成绩优异，因为父母是右派，都不予录取。他只好到北京郊区下乡，又做了学徒工，一直坚持博览群书。文革初，面对血统论，24 岁的他完成了《出身论》，经《中学文革报》在国内广泛传播。他主张人生而平等，废除中国普遍存在因为家庭出身带来的人权歧视。他在人权领域的历史贡献，可以与马丁·路德·金并论。1970 年 3 月 5 日，他被判死刑，还不足 28 岁。1979 年，他被平反昭雪。1980 年，他得到公开宣传。但直到 1998 年，他的遗著不曾结集成书。徐晓原来计划在自己供职的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报社的领导提出，如果收入他当年报道遇罗克的文章，就要履行送审程序。一送审，书就可能流产。于是徐晓决定不收社领导报道遇罗克的文章，

自己投资，拿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总算在 1998 年底问世。

因为这本书，我认识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他是《中学文革报》的创始人之一，文革中两度入狱。我提议他写一本回忆录，讲述个人经历和一家人的命运。1999 年秋天他就写成回忆录《我家》。2000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作了序。

出完遇罗克，我还想出王申酉文集。他是同代人中的另一个杰出思想家。1945 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17 岁考入华东师范学院物理系。文革前，他就开始独立思考，反思三面红旗，批评个人迷信，为右派分子鸣冤。文革中他一直挨整，不分配工作。毛泽东去世后，他给女友写信，表达自己的政见，被监视者告发被捕。他 1976 年 11 月 18 日到 23 日写了长篇“供词”，全面地反思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主张。因为思想超前，他于 1977 年 4 月 27 日被判处死刑，年仅 31 岁。

拨乱反正的年代，在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上海市委周克等人努力推动下，王申酉得到平反昭雪。《人民日报》准备大张旗鼓地宣传，派记者金凤采访，写成长篇报道。有关领导人说金凤的报道写得很好，却要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金凤把王申酉留下的日记、书信、自白和自己的长文合成了一本书，屡次寻求出版机会，都不成功。我和金凤商量，以王申酉的遗作为主，连同金凤的报道和相关回忆，编成《王申酉文集》，几次尝试在国内出版，接连碰壁，只好在香港出版。施平先生已经 112 岁，仍然在世。他的孙子名叫施一公。

韦君宜的《思痛录》出版于 1998 年。她在 1976 年开始动笔撰写《思痛录》，一本十几万字的回忆录写了十几年，完成的时候已经中风，半身不遂。这本书的主题是反思自己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她最痛心的是，当初放弃留学机会，从清华投奔延安。留学美国的同学，成了世界知名的学者。她则遭遇抢救运动，不得不违背良心，说假话才能过关。她是出版家，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对自己这本书的出版，却不抱希望。

这本书责任编辑是我妹妹丁宁。她也是新三届，北大一分校 78 级，毕业后进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 年，他们社拟订了一个“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计划，体裁是回忆录，要求作者是名家。丁宁向我求助。我知道韦君宜有一部回忆录在亲家牧惠手里，就说，找牧惠联系书稿可以，最好取稿同时签合同。领导同意。1998 年 2 月下旬，我和丁宁来到牧惠家中，取了稿子，签了合同，承诺三个月出书。丁宁把稿子拿回来一读，非常震惊，还没有一本书如此痛彻地反思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同时解剖自己的灵魂。总编辑李志强看了稿子说，删一点可以出版。于是，一审、二审、三审，前后删了三遍，锋芒稍减，未伤元气。1998 年 5 月 12 日，《思痛录》第一批样书印出。牧惠带着丁宁到协和医院，把样书送到了韦君宜手上。病重的韦君宜已经说不清话，但十分激动。牧惠还把搜集的关于《思痛录》的评论文章交给孙珉和我太太邢小群，编成《回应韦君宜》，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使得《思痛录》的回声，得到了集中的展示。我还推荐了何济翔《沪上法治梦》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也纳入《百年人生》丛书出版。

再说黄万里。他是黄炎培的长子，30 年代的留美博士。50 年代，中国让苏联专家设计三门峡水库，中央请 70 个专家论证，只有黄万里一个人反对建坝。他被打成了右派。三门峡水库第一年蓄水，第二年泥沙淤积，渭河流域遭遇水灾，威胁到西安。2000 年，我和朋友赵诚、《老照片》主编冯克力、编辑张杰一起到清华大学九公寓，拜访了黄万里，当时他已经 89 岁。他向我们讲述，他为什么反对在三门峡和三峡建坝。赵诚撰写的文章《但教莫绝广陵散》在《老照片》刊出，黄万里十分认可。2001 年 8 月 26 日，黄万里与世长辞。临终前，教研室同事帮他编了一本《黄万里文集》，只印了 500 本，内部

散发。我觉得很珍贵。黄老的长女黄且圆是杨乐夫人，我和她商量，增加四篇有现实意义的文章，自印一千本。冯克力建议，组织《黄万里传》，请赵诚撰写。赵诚表达了立传的愿望，黄家全力支持。把黄老的日记、诗词、书信、未曾发表的手稿都给赵诚参考。赵诚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寻访黄万里的同事学生和工作现场，作了艰苦的调查研究。赵诚当时得了肺癌，切了一叶肺，上楼都很吃力，走南闯北更为不易。但他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使传记更加丰满。山东画报出版社和他签了合同，却不敢履约。又找了几家出版社，也不敢拍板。2004年春天，出版家刘硕良来北京，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想以体制内外结合的方式推动优秀图书出版。他问我有什么书稿可以推荐。我当即推荐了赵诚撰写的《黄万里传》。刘硕良用了三个月时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以《长河孤旅》的书名推出。接着，赵诚又把黄万里的遗著和诗词，编成《追寻黄万里》，在山西出版。去年年底，赵诚病逝，享年70岁，他也是新三届，1977年参加高考，被太原师专录取。

新三届已经陆续离开社会前台，进入养老族的行列。回首四十年，略感欣慰的是，我参与过有关黄万里、顾准、韦君宜、遇罗克的出版，传播过他们的精神。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先贤的名字还在流传，没有被时间湮没。

黄万里生于1911年，顾准生于1915年，韦君宜生于1917年，比我们长一辈。遇罗克生于1942年，比我们年纪稍长，基本上是同代人。我为什么说从他们身上找到了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座标，基于两点：

一是智慧，思想上先知先觉。黄万里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顾准、遇罗克在政治社会领域，都提出了超越时代的独立见解。韦君宜不是先知先觉，也是大彻大悟。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二是风骨，人格上坚守良知。顾准要当以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遇罗克说：乾坤特重我头轻，他是舍生取义的典范。黄万里完美实践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韦君宜一息尚存，也要解剖自己，留下沉痛的历史教训。古代圣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在他们身上得到活生生的体现。他们的精神遗产，比肉体生命更长久。

这对于我们和后来的读书人，如何处身立世，如何面向世界，走向未来，或许不无启示。

谢谢大家！

演讲结束时，在座的新三届学友们给以长时间掌声鼓励。中国人民大学的马道学友还写了一首诗：

赞丁东陈剑二君

长思姜翁钓渭水
再叹柳公悲潇湘
纵使鸟绝君未至
总有孤蓑立寒江

新三届学友们的鼓励，我将铭记在心，继续前行。

（作者：文史学者。来源：丁东小群，2023年12月15日）

以农业开启和平之路

肯尼斯·奎因(Kenneth Quinn)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挑战

面对气候变化、人和动植物的潜在全球流行病、迅速蔓延世界的蝗虫和昆虫群、肆虐的森林大火和日益减少的淡水供应等艰难险阻，人类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我们能否可持续地生产和分配足够的营养食物，以养活到 21 世纪中叶地球上 90 亿至 100 亿人。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必须实现与上述“最大的挑战”有关的两大不同目标：第一，必须出台增加粮食产量和供应的政策和创新措施；第二，鉴于俄乌冲突致使全球粮食体系遭到严重破坏，世界保持和平是绝对必要的，中美两国之间的和平更是举足轻重。

有助于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的最佳途径是，中美两国开辟建设性的合作方式，共同应对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粮食安全挑战。本文建议中美采取维护和平与促进非洲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合作方式。预计到 2050 年，非洲人口会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10 亿。

“绿色革命”和杂交水稻带来的启发

过去 50 年，也就是从 1969 年到 2019 年，是历史上在粮食生产和减少饥饿方面最伟大的时期。在这场“绿色革命”期间，贫困和营养不良水平以及饥荒的发生率迅速下降。

这一非凡成就在全球遍地开花。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东的多个国家都书写了佳话，但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相媲美。在过去 40 多年里，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农业和经济实现转型，减贫成绩斐然，绝对贫困人口接近零，全国粮食供应特别是大米供给显著增加。

与中国这一历史性进步联系最密切的人物是已故的袁隆平教授。从他第一次在海南三亚市外的田间进行第一次敏锐观察，到他在长沙著名的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行植物育种的突破性科学创新，袁隆平教授走在中国史诗般发展的最前沿，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获得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授予的中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回想袁隆平教授在开发高产水稻新品种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非凡成就，令人肃然起敬。2004 年袁隆平教授前往美国艾奥瓦州得梅因市，接受被誉为“食品和农业领域诺贝尔奖”的“世界粮食奖”，我非常荣幸地见到了袁隆平教授。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顶尖科学家和专家出席了颁奖典礼，世界粮食奖创始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农业科学家和“绿色革命之父”的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博士向袁隆平教授颁发了奖杯。

当时袁教授和博洛格博士一起，接受世界科学界的掌声，他们可以说是各自国家最伟大的农业科学家，代表着农业科学真正的变革力量，减轻了人类因粮食安全问题而遭受的痛苦。我无比荣幸地与他们两人密切合作了十多年。

到 2049 年，地球上的人口将达到 90 亿至 100 亿，世界面临着可持续地提供营养食物的巨大挑战。袁教授的科学成就特别是在开发高产水稻新品种方面的成就，以及博洛格博士在小麦方面取得的伟大成

就，使南亚避免了大规模饥荒，挽救了数亿人的生命。这将极大地鼓舞下一代植物科学家和政治领导人迎接新的“生存挑战”，并为和平而奋斗。

艾奥瓦州与河北省独一无二、具有历史意义的联系

美国艾奥瓦州是博洛格博士的出生之地，与中国有着独特的关系。

2023年是艾奥瓦州与河北省缔结友好省州关系40周年。这40年的核心之举是，1985年河北省一位名叫习近平的年轻县委书记访问美国艾奥瓦州。27年之后，作为国家副主席、即将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他再次访问美国，为加强中美在农业研究和农村发展方面的合作、共同应对巨大的全球性挑战奠定了基础。

通过农业促进和平

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绿色革命”开始时，我在湄公河三角洲农村工作。那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农业不可思议的变革力量，农业减少了农村地区的冲突，同时提升了农户的福祉，他们使用了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发的高产水稻新品种IR8种子。

此外，我观察到只有在农场到市场的道路得到改善的村子里，农民才会使用新种子，这是我一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在后来的40年里，我每访问一个国家，都要分析那个国家农村道路升级改造与扩大农业生产之间的联系。

根据我外交生涯中的这些经验，在我担任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的20年间，我努力强调农业发展与促进和平之间的重要关系。在这一努力中，我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每年在艾奥瓦州得梅因市举办博洛格对话研讨会。其他活动包括：聚焦中东地区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以色列、埃及和巴基斯坦专家纷纷发言；就阿富汗战争问题举行一届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农业部长参加的研讨会；举办2012年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习近平主席作了主题演讲；邀请伊朗的一位农业科学家参加研讨会，我在伊朗农业生物科技研究所作主题演讲，随后几年我邀请世界粮食奖得主在德黑兰会议上发言；2017年博洛格对话以“脱贫之路”为主题，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金武米·阿德西纳（Akinwumi Adesina）成为新晋世界粮食奖得主。

饥饿使人们跨越最广泛的政治分歧而团结在一起，影响最深远的时刻出现在2012年的颁奖典礼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以色列灌溉技术先驱丹尼尔·希勒尔（Daniel Hillel）颁发了世界粮食奖奖杯。希勒尔曾得到来自三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三位穆斯林科学家的提名，他曾在那些国家工作，致力于改善当地农村生活。

显示在关键时期改善关系的潜力

2020年我从世界粮食奖基金会退休之后，接受了美国腹地中国协会（USHCA）主席、密苏里州前州长鲍勃·霍顿（Bob Holden）的邀请，担任该协会的战略顾问。在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讨会期间，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腹地中国协会利用Zoom新技术举办一系列虚拟“农业圆桌会议”，以农业为重点开展合作。美国腹地中国协会方面由执行董事范敏女士领导，2021年这些虚拟会议在中美两国获得了好评。

这些圆桌会议是在两国政府关系非常紧张的时期举办的，为中美之间建设性的双边交流提供了机会，协会高层政治领导和农业企业领导出席了会议，包括艾奥瓦州州长金·雷诺兹（Kim Reynolds）、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达林·拉胡德（Darin LaHood）以及约翰·迪尔（John Deere）、艾地盟（ADM）、先正达（Syngenta）等中美两国主要农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基于上述积极成果，美国腹地中国协会认为，要想促进中美两国在农业研究和全球发展领域的进一

步合作，共同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全球性挑战，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主要的农业州是首选之地。

2022年4月在艾奥瓦州得梅因市成功举行了中美农业对话，我把这种做法称为“分叉外交”（bifurcated diplomacy），反映出外交官员更愿意接受非政府组织的邀请，而不是安排直接对政府的双边会议。

继得梅因对话之后，又在圣路易斯市举行了2023年美国腹地中国协会农业对话，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致辞，河北、江苏和山东省的代表团参会。

脱贫之路与和平之路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全球发展：共同使命与行动价值”国际智库与媒体高端论坛上，我作了题为“非洲脱贫之路：艾奥瓦州启发下的中美合作”的报告，并在报告中表示，通过比较1980年与2020年的中国公路，可以证明农村道路改善和升级与全国减贫之间存在着明确关联。

1979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时，中国处于贫困状态，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外，农村公路普及率不足50%。

在回顾中国脱贫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时，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对“农场到市场”的道路进行改善和升级，扩大路网，覆盖全国几乎所有农村地区，同时引进袁隆平教授革命性的杂交水稻。

2022年10月16日的《中国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正确的方向是中国扶贫的核心》的文章，文中引用了我的话：“没有公路的地方充斥着贫穷、饥饿和营养不良。在中国，公路建好了，贫困地区就开始复苏。”然而，2022年非洲的贫困和粮食安全水平仍接近1979年的统计数据，农村公路网改善率仍仅徘徊在50%左右。2013年我在联合国发表世界粮食日致辞，提出“公路的尽头是贫困、饥饿、营养不良和冲突开始的地方”。

我的农业梦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了非洲大陆以农业发展为重点的建议。该倡议题为“脱贫之路：艾奥瓦州启发下的中美非合作”，特别呼吁中国、美国和非洲展开合作，共同开展研究，提高农作物产量，大力升级农村道路基础设施，推动非洲的农业发展。

由美国腹地中国协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圣路易斯市共同举办的中美农业对话结束时，我发言谈到了“我的农业梦”。在“梦”中，我设想中美两国高层领导能够重返艾奥瓦州，再次来到底蕴深厚的世界粮食奖桂冠殿，在袁隆平和博洛格精神的启发下，共同宣布两国将与非洲开发银行等非洲关键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促进整个非洲大陆农村道路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升级。这样，通过共同努力应对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中美也将促进两国之间的和平以及世界的和平。

2023年10月，将在得梅因市举行2023年世界粮食奖颁奖典礼。一个月之后，将在旧金山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美国腹地中国协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组织计划举行2024年美中农业对话。这些活动都会为中美两国应对当前一系列消极问题提供良机。美国和中国可以重拾习近平主席2012年访问艾奥瓦州时的精神，致力于建立前所未有的伙伴关系，确保地球成功克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挑战。本文系作者在“中国与世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主题发言作者系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8月7日）

农村老人刷短视频怎样开启“健康模式”

赵新宁

“吃洋葱通血管，每天必须吃一个。”“只要刷这个视频，每天都能赚钱。”“退货的速度跟不上老妈买劣质产品的速度”“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枕边的手机，睡前躲进被窝也要刷视频”……最近，笔者身边很多朋友总是谈到，自己在农村老家的父母染上“网瘾”了，老人家闲来无事，沙发角里一窝，或床上一躺，就捧着手机不停地刷短视频，不只看，还在短视频里购物，在直播间里打榜应援，一玩几个小时，根本停不下来，户外活动越来越少，对老人健康的影响实在令人担忧。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60岁及以上网民占网民整体比例快速上升，截至2022年12月，老年网民规模达1.53亿。今年春节期间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过半农村老人的娱乐是刷手机短视频。这些都表明，随着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平台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成了短视频平台的用户。

短视频为何会受到农村老年人的喜爱？从客观条件来看，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生活条件提升，智能设备得到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使用上智能手机。在使用智能手机过程中，短视频功能操作简单，内容清晰易懂，浏览、制作、传播都十分方便，即使是文化程度较低，甚至不识字的农村老人也能轻松使用。从主观条件来看，农村老人与子女分隔两地的较多，日常生活简单固定，空闲时间比较多，同时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一定的需求，短视频便成了他们与子女联系，拉近与子女心理距离，或弥补情感缺失的现实选择。

如果说上述原因是短视频受到农村老年人喜爱的“主动因素”，那么，还有一些“被动因素”也要考虑进来。一些短视频运营商通过大数据算法，抓取老年人的娱乐和情感需求进行“个性化投喂”，通过不断推送符合老年人口味的内容，牢牢锁住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一刷就停不下来”，不知疲惫，甚至成瘾。此外，一些短视频抓住农村老人的心理特点，在短视频直播间里，经常有主播教老人怎样购物付款、抢秒杀价、拼手速。在短视频操作界面，用户每日签到、观看短视频与直播、浏览低价商品等，可领现金红包或金币作为回报，金币可兑换为“抵用金”，还可以提现，这些设置都在诱导老人不停刷短视频。

现实中，一些老人通过短视频了解新闻信息、听历史故事、跟跳广场舞，丰富了老年生活，拓宽了社交范围，收获了益处。但也有一部分农村老年人刷短视频弊大于益，比如笔者了解到，一些老人长时间低头刷短视频，缺少活动锻炼，容易造成颈椎、脊柱、肩部及腰部损伤，对眼睛也不好，危害身体健康。同时，农村老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容易盲目相信一些未经核实的短视频信息，特别是一些伪科学、养生健康类短视频，如果老人们接收到的是一些负面信息，还会导致他们陷入“信息茧房”，增加焦虑情绪。农村老人对网络购物的筛选辨别能力比较薄弱，缺乏判断力，更容易在短视频里花“糊

涂钱”“冤枉钱”，甚至陷入网络营销、网络诈骗的陷阱，蒙受财产损失和身心伤害。这些负面影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如何引导帮助农村老人更健康地在短视频平台“冲浪”，需要各方努力。乡镇村庄可以多组织开展一些服务老年人的线下活动，鼓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乐趣，也可以给农村低龄老人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任务和锻炼机会，让老年人的生活充实起来。另外，还要做好科普宣传，有针对性地教农村老人辨别网络骗局、保护个人隐私，增强网络安全意识。相关平台也要加强把关，对含有误导、欺诈以及低俗信息的内容，完善投诉机制、及时处理删除，着重打击针对老年人群体进行不当消费引导的短视频。子女也要尽力给予父母更多陪伴，多回家看看，多跟父母打打电话，聊聊天，耐心地讲道理、做引导，还可帮助他们给手机设置健康模式，限制使用时间，从而更好地趋利避害，健康“冲浪”。

（作者：农民日报记者。来源：农民日报，2023年11月29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农科院机关及各研究所、中国食药促进会
发：中国食药促进会秘书处及各部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毛振宾
副 主 编：谢久忠 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